

地缘势能与区域整合：川盐古道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价值重塑

刘港*, 宋生涛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重庆万州, 中国

*通讯作者

【摘要】川盐古道作为中国西南腹地历史上极具浓墨重彩的文化遗产，其形成与演变绝非单纯的商品贸易空间投影，而是地缘政治博弈与区域经济之间深层耦合的产物。本研究试图跳出传统历史地理的描述性框架，借由地缘经济学与施坚雅区域系统理论的视角，搭建一个贯穿“资源—通道—制度”的解释框架。研究认为，川盐古道的兴起，本质上源于四川盆地井盐资源的垄断性禀赋与周边山区市场刚性需求互相影响作用下产生的巨大发展势能；其历史延展过程，嵌入了宋代边疆开发的政治渗透、明清“官岸制度”的行政规制，以及抗战时期国家战略安全的应急重构。文章进一步剖析了这条古道在重塑西南“核心—边缘”地缘结构中的关键作用，并结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时代背景，探讨了其从单纯的“运输通道”向复合型“文化廊道”转型的遗产活化路径。

【关键词】川盐古道；地缘经济；施坚雅模式；川盐入黔；文化线路；区域一体化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盐业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建档保护与校内课程活态传承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2025NDYB115）

1. 引言

1.1 问题之源与研究向度

在漫长的古代农业社会图景中，食盐之于国家，既是关乎万民生计的必需品，更是维系财政命脉与撬动地缘博弈的战略杠杆。正如《另一种延伸》一文中所述，川盐古道不仅支撑了古代西南的经济命脉，其留下的古镇与会馆遗产更在今日展现出巨大的价值[1]。管子有云：“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这种无可替代的消费刚性，注定了食盐的产地与销区之间，必然通过高强度的经济纽带紧紧捆绑。

目光投向中国西南，复杂的地形与多样的民族构成了一幅复杂的拼图。四川盆地凭借得天独厚的井盐资源，天然占据了西南经济版图核心区的地位。相比之下，贵州、鄂西、湘西及滇北等地，受制于地质条件，不仅极度缺盐，且交通闭塞，沦为广袤的“边缘区”。川盐古道正是在这种极端的资源禀赋差异下，被生存需求打磨出的生命线。它如同一张强韧的网，穿越秦巴山区、武陵山区和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将原本因山川、江河所割裂的地理单元缝合为一个紧密的地缘经济共同体。

然而，审视既往学界成果，多集中于古道走向的考证、制盐技术的复原或单一历史断面的描述，鲜少从宏观的地缘经济视角，

研究这条古道的全貌。究竟是什么力量驱动川盐古道穿越森严的行政边界？历代官府又是如何利用这条盐道来从容调控边疆？在当今“一带一路”与区域一体化的新语境下，这条古道又该如何焕发新生？本研究试图通过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与地缘理论结合，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

1.2 理论视角的介入：地缘经济与区域系统

研究主要引入两个理论支点来支撑分析框架：

其一，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不同于传统地缘政治对领土归属与军事征服的关注，地缘经济学更侧重于“资本逻辑的空间展开”。相关比较研究表明，川滇等地的盐文化交流不仅仅是物资的互换，更通过盐币功能、饮食习俗的渗透，构建了大井盐文化体系，重塑了区域内“各自为大”的格局[2]。在川盐古道的背景下，四川凭借盐井资源的刚性需求垄断，对周边省份形成了天然的“贸易顺差”和“经济牵制力”，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依赖，在历史上深刻重塑了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其二，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理论（Macro-regions）。这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曾敏锐地指出，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并非由僵硬的行政省界所切割，而是由山川地形与市场网络交织而成的“宏观区域”所定义。四

川盆地作为一个典型的宏观区域，其内部呈现出“中心城市—周边乡镇—边缘腹地”的清晰层级。川盐古道，正是连接这三个层级的“动脉”，它将核心区的文明范式、技术红利与制度安排源源不断地输送至边缘区，完成了区域功能的深度整合。

2. 资源禀赋与地缘势能：川盐古道形成的地理基础

2.1 “盆地效应”下的资源垄断

地理环境往往为经济发展预设了初始代码。四川盆地作为一个典型的封闭构造盆地，三叠纪时期遗留的内陆湖泊环境，为其封存了储量惊人的地下卤水资源。自李冰父子凿井汲卤以来，四川便跃升为中国井盐最为发达的区域，孕育出一系列盐业重镇，赵逵在对川盐古道形成的研究中详细梳理了其成因及“四横一纵”的线路分布特征[3]。现代聚落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以宣恩彭家寨等为例，川盐古道深刻影响了沿线传统聚落的形态，使其由散状向带状演变，呈现出高度的资源与交通指向性特征[4]。

反观贵州高原、鄂西山区，其地质构造以喀斯特地貌或变质岩为主，盐卤资源极度匮乏。这种“川有黔无”、“川有鄂缺”的要素禀赋差异（Factor Endowment Differential），构成了川盐外运最原始且强劲的动力。在地缘经济学的词典里，这被称为“地缘势能”。正是这种势能的巨大落差，足以冲破“蜀道难”的地理阻隔，驱使商贾在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一条条运盐的孔道。

2.2 地理规制下的交通突围

川盐古道并非仅仅是一条线性的道路，实质上，它是一套顺应地理肌理、在极高成本约束下自我演化的水陆联运系统。这套物流网络的延展逻辑，是古人不断找寻天堑与低成本物流之间博弈的结果。

在四川盆地内部及边缘地带，长江、岷江、沱江与乌江等庞大的水系构成了盐运的天然骨架。这种低阻力、大运量的水运通道，不仅定义了古道的主动脉走向，更通过航运红利直接催生了泸州、重庆、涪陵等沿江口岸城市的早熟与繁荣，使其成为地缘经济辐射的初级增长点。

然而，当运输线向贵州高原与鄂西深处的地理褶皱延伸时，水运的效益递减直至归零。在赤水河、乌江等水系的通航终点，古道被迫完成了从自然水道向人力背运与马帮驮运的形态切换。这种由水转陆的节点，往

往也是物流成本陡增的分界线。尽管陆路转运的成本高昂，但在盐业专卖的垄断市场结构下，这种高昂的交易费用并未阻断贸易的“毛细血管”渗透，而是被刚性的消费需求层层稀释，最终通过价格机制顺利转嫁，从而维持了整个地缘经济网络的末梢循环。

3. 历史演进：从边疆经略到国家纵深

川盐古道的历史生成，并非自然生长的线性过程，而是国家地缘战略在西南腹地不断深化的空间投影。

3.1 宋代的经济软控制

宋代构成了川盐古道具有地缘政治性的雏形。彼时，随着王朝经济重心南移，面对川南及黔北这片仍处于部落自治状态的社会，宋廷并未沿用高成本的军事征服旧路，而是转向了一种更为隐蔽且高效的“经济进军”策略。官方一方面通过政策诱导，鼓励汉族移民深入川南开凿盐井，在民族杂居区嵌入一个个汉文化的“飞地”；另一方面，利用“博易场”确立了食盐与马匹、土货的交换体系。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将食盐从单纯的商品异化为一种“软性控制手段”，以盐为饵，建立起边疆社会对核心区的依附关系。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盐权扩张，以极低的地缘成本，完成了中央治权在西南边疆的初步经济确权。

3.2 明清时期的化利为官方所有

如果说宋代的扩张带有自发性质，明清时期则标志着川盐古道进入了国家权力的严密规制时代。得益于“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填充与卓筒井技术的迭代，四川井盐产量井喷。特别是雍正朝“改土归流”之后，贵州建省彻底打破了行政藩篱，使得原本处于灰色的民间商道被正式纳入国家特许经营体系。

“永、仁、涪、綦”四大官岸的确立，是明清时期国家行政权力对市场空间的切割与重塑，赵逵的研究详细论证了这四条主要线路的走向与分布[3]。通过“引岸制度”，清政府在古道沿线建立了一套包含运司、盐大使在内的垂直官僚系统。这使得古道不再仅仅是物资流动的载体，更演变为一条制度输出的廊道——四川的商业资本借助行政特权，与贵州的资源（木材、矿产）完成了深度置换，将松散的贸易往来固化为结构紧密的“川黔地缘经济体”。

3.3 抗战时期的战略价值

川盐古道地缘价值的最高爆发点，与国家生存危机互为表里。抗战时期沿海盐场的全面沦陷，国家遭受海路断绝的系统性冲击，

四川作为中国的战略腹地，会从边缘走向中心，承担起“战略备份”的关键职能。

在全民抗战的国家意志驱动下，这条古道经历了一次战时背景下的极限动员，自贡盐场的增产、赤水河航道的疏浚以及数十万运输大军的组织，并非纯粹的市场行为，而是战时经济的应急重构。这一历史切片深刻揭示了川盐古道的双重属性：它平时是区域经济的动脉，战时则是国家战略纵深的生命线——证明了在内陆腹地保留一套独立于沿海体系之外的经济循环系统，对于维护国家生存安全的重要性。

4. 川盐古道运行的地缘经济机制剖析

川盐古道之所以能历经千载而不衰，其背后运行着一套精密的地缘经济机制。

4.1 核心—边缘的级差地租机制

依据施坚雅模式，四川盆地作为“核心区”，掌握着资本、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盐）；而周边山区作为“边缘区”，主要提供初级产品。川盐古道便是这种非对称交换的载体。四川盐商在贸易中攫取了巨额的级差地租——盐在产地价格低廉，一旦运抵贵州山区，价格往往翻涨数十倍。这种扣除运输成本后的巨大利润回流至四川，进一步固化了其作为西南经济中心的地位，造就了自贡、重庆的繁荣，也客观上造成了边缘地区的资源单向流出与依附。

4.2 制度经济视角：引岸制度与垄断

川盐古道并非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典型的“官督商办”体系。清政府实施的“引岸制度”，即划定销售疆界、颁发特许执照，是地缘政治干预经济的典型样本。严格的“楚盐不行川，川盐不行楚”规定，虽然在经济效率上存在损耗，却在政治上确保了税收的汲取与对各省的控制。这一制度催生了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地域性商帮（如陕西、江西商帮），他们依托同乡地缘关系，垄断了古道上的关键节点，成为地缘经济的实际操盘者。

4.3 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与文化梯度扩散

川盐古道还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一方面，它催生了城镇带的崛起，丙安、土城、龚滩等古镇因盐而兴，彻底改变了山区的聚落形态；另一方面，它推动了文化的梯度扩散。伴随盐运，四川的方言、戏剧、饮食与建筑风格沿江而上，深刻浸润了贵州与鄂西的文化土壤。赵小平与胡月的比较研究指出，这种跨区域的文化渗透在饮食习俗和盐文化体系中表现得尤为

明显[2]，正是川盐古道作为地缘文化传播带的直接确证。

5. 川盐古道的当代价值重塑与路径选择

随着高铁与高速公路网的全面覆盖，川盐古道作为物质运输通道的历史使命已然终结，但其作为文化载体与区域情感纽带的地缘价值，正迎来价值回归。

5.1 遗产活化：构建跨区域文化遗产廊道

川盐古道具备申报线性文化遗产的潜质。杨雪松和赵速的研究对照 ICOMOS 定义，论证了川盐古道具备文化线路的形态特征与价值体现，是潜在的线性文化遗产[5]。它串联起的盐井遗址、古道残垣、会馆建筑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船工号子），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

未来的保护与开发，应突破行政区划的藩篱，建立川、渝、黔三地政府的联动机制。针对目前川盐古道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缺乏协调、破坏性开发等问题[6]，应借鉴丝绸之路的申报与管理经验，构建跨省域的文化遗产廊道，通过统一的标识系统与规划布局，将其打造为中国西南独具辨识度的文化名片。

5.2 文旅融合：边缘区的乡村振兴引擎

古道沿线多为曾经的经济边缘区。在地缘经济的新常态下，文旅产业将成为“边缘突围”的关键。最新的定量分析表明，文化遗产嵌入式旅游的效率受到交通、信息化及政策等因素的显著影响[7]。可以通过开发沉浸式的“重走盐道”体验项目，利用数字技术复原古代盐运场景，挖掘“盐帮菜”等特色资源，将历史上的“苦难之路”转化为现代人的“体验之路”。以旅游消费流替代昔日的食盐物流，为沿线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

5.3 区域协同：服务双城经济圈与“一带一路”

历史早已证明，川渝黔鄂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经济互补性。挖掘古道的历史底蕴，有助于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周边省份的文化认同，消解行政壁垒，推动“川渝黔”经济合作区的实质性建设。同时，现代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诸多线路走向与古道惊人重合，对古道沿线聚落特征与形成机制的深入研究[4]，对于优化现代物流枢纽选址、理解区域经济流向，依然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6. 结语

川盐古道，是一部镌刻在山川褶皱间的地缘经济史书。它始于自然资源的势能差异，成型于国家战略的博弈经纬，繁荣于区域市

场的互补共生。研究表明，其发展逻辑始终遵循着地缘经济的法则：核心区通过掌控稀缺资源与通道网络，实现了对边缘区的经济整合与文化辐射。这种整合机制，不仅奠定了历史上西南中国的地缘结构，更为当下的区域协调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回响。面对未来，我们应超越单一的文物保护视角，在区域发展的宏大格局中重新审视川盐古道，让这条千年的“地缘动脉”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继续搏动，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 [1]另一种延伸——川盐古道对于沿线经济发展的意义[J].看历史, 2013, (11).
- [2]赵小平, 胡月.川滇盐文化比较研究[J].中国盐文化, 第9辑 : 52-64.
- [3]赵逵.川盐古道的形成与线路分布[J].中国三峡, 2009, (04) : 46-55.
- [4]陈慧.川盐古道宣恩地区的传统聚落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J].中外建筑, 2023, (11) : 98-103.
- [5]杨雪松, 赵逵.潜在的文化线路——“川盐古道”[J].华中建筑, 2009, 27 (03) : 120-124.
- [6]邓军.川盐古道文化遗产现状与保护研究[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0 (05) : 35-44.
- [7]Lin, S., Zhang, M., Feng, L., Lu, M., Liu, X.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al heritage embedded cultural tourism efficiency[J].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5, 13 : 1690535.